

特 稿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中国与国际秩序

王缉思

21世纪以来，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成为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现象。特别是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得越来越“奋发有为”，世界各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亨利·基辛格在他2014年出版的新书《世界秩序》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探讨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他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比以往‘积极’了很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都恢复了它历史上鼎盛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地位和影响力。……问题在于，中国将如何参与世界秩序的构建？特别是它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¹ 几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艾肯伯里就提出过，“在很多重要方面，中国是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国家’（the ‘swing state’）”。他进而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是将寻求对抗进而推翻正在演进中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国际秩序呢，还是将逐步融入现存秩序并强化在该秩序中的权力？”²

在中国国内，对于如何看待现存国际秩序，如何处理同国际秩序的关系，也存在不同意见和观念。一种观点认为，现存国际秩序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中国强大起来以后，应当在国际体系中“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摆脱美国霸权的新秩序。另一种观点强调，中国的长远目标是融入国际秩序，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成为其建设者。还有一种观点隐藏在对国际实力的谨慎评估之后，即中国目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p. 226.

2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43.

前的实力还不足以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因此应当继续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待到实力足够强大之时，再像冷战后初期的美国那样，驰骋天下，“想打谁就打谁”。本文试图厘清一些相关的基本概念，浅析中国同国际秩序关系的基本态势，为进一步研究该问题做思想观念上的铺垫。

一、何谓“国际秩序”？何谓“中国”

“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是伴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诞生而产生的概念。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此后的国际秩序都依此而建立。本文之所以采用“国际秩序”而非“世界秩序”(或“全球秩序”)的概念，是因为前者以主权平等的国家为基本单位，而后者所指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更为宽泛，可以包括诸如跨越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所构筑的帝国秩序，也可以包容当代参与全球治理的许多非国家行为体所建立的某种制度安排。

对于“秩序”的概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做过详细的辨析。¹他提出，在国际政治语境中，“秩序”有三个特征特别值得关注，即稳定性(stability)或可持续性(durability)、和平状态(peacefulness)，以及合法性(legitimacy)。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秩序问题多有论著，恕不多加引用，只摘取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的一段论述。基辛格说：“每一个国际秩序迟早必将面对挑战其内聚力的两种趋向的冲击：或是对合法性的重新界定，或是实力均衡的重大变动，二者必居其一。”²本文中所指的“国际秩序”借鉴了基辛格的观念，指的是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下，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力量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运行规则。简单说，国际秩序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是结构(structure)，在中文中常称之为“格局”，指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力量分布、实力对比和相互关系；第二是具合法性(即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它们规约着国家之间的相互行为。在这些规则和机制基础上建立的国际机构，也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何谓中国”表面上看似不成问题——“中国”当然是指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与“中华民族”常常通用，而“海外华人”(华人血统而持外国国籍)也同“中国人”混用。仔细辨别起来，“中国”的身份认同有三种。第一是“政治中国”，即当代主权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却未实现同它的

1 根据唐世平教授2015年4月28日在复旦大学就此题目举办的专题讲座。

2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p. 365.

政治统一；包括香港澳门，与之实行一国两制。这种政治状态与安排在上世界上独一无二。第二是“文化中国”，主要指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传承，有时特指汉文化圈。这一文明自古以来没有断裂，但历史上的国家多以朝代命名，除清朝（恰好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形成和演变的时期）和中华民国以外，历史上的“中国”和今日中国并无国际法上的继承关系。这一事实往往不为国内论者所认识。¹ 第三是以汉族为主体的“血脉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口号中所讲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仅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可能包括海外华人在内。什么是中华民族及其鼎盛时期，“复兴”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不能指望会出现权威界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为后两个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发表的论著汗牛充栋。² 正如许倬云所说，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³

本文所论述的“中国与国际秩序”，指的主要是“政治中国”。但不能回避的难题是，当代中国人是从几个不同语境上理解和阐述“中国”的。虽然中国是以现代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但近年来日趋强大的中国在其战略诉求、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行为逻辑等方面，却常常超越了这一层次的身份认定。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倡议，都让他国明显感受到，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和血脉的历史存在。中国属性和中国人认同的多重性，一方面可能为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中国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时语境的错位，进而引起沟通不畅甚至是误解。

虽然中国是以现代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但近年来日趋强大的中国在其战略诉求、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行为逻辑等方面，却常常超越了这一层次的身份认定。

二、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内容

要界定当今国际秩序，首先要看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实力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得益于相对开放有序的国际秩序，以及全球化历史进程，那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各大洲均有一批国家逐渐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国际格局正越来越从以往的“两极”或者“单极”垂直结构走向更加扁平的结构，但还没有形成“多极”。今日之国际社会犹如群星璀璨的夜空，而非一轮皓月耀天庭。

1 有文章认为，南沙群岛自汉武帝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一主张在国际上得不到呼应，是因为现代国家疆界并不以古代史为凭据。

2 近年来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当然，在这满天星光中，最闪亮的那些星座尤为引人注目，它们所组成的轮廓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夜空中的方向。本文用“一、二、三、多”来大致描绘这个轮廓。

“一”指美国，是亮度最高的那个星座。美国仍然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仍将远超任何一个国家。美国自身实力在继续上升，比其他发达国家发展更快，但同中、印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多种结构性因素促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

“二”指中国和欧盟两大力量。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亚洲大国，但在亚洲的影响力受到美、日、印、俄等国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制约。中国是其几乎所有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然而仍是一个区域性国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投射力主要在亚洲。中国的旅游者和商业活动现已遍布全世界。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展，但其深度有限。经常有中国人说本国是“世界老二”。其实，如果到中东（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等国）、东欧（如乌克兰、波兰等国）、拉美（如巴西、墨西哥等国）等地区做一番考察，即可发现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达不到“老二”的地位。在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领域，中国也远远谈不上“老二”。

如果作为一个统计单位，欧盟的经济总量现居世界第一。欧盟有28个成员国，已经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净财富居世界首位。欧盟在维持欧亚大陆西部和南部的和平稳定方面，在维系全球金融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过，受成员国之间发展不平衡、主权债务危机、高失业率、人口老龄化、社会矛盾加深等瓶颈的制约，加上世界经济整体增速下滑，欧盟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呈现波动低速增长，其速度低于美国 and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移民大批涌入改变了欧洲社会的族群和宗教结构，尤其是穆斯林移民难以“归化”，对欧洲社会缺乏认同感。欧盟社会思潮混乱，各国政治受到左右力量撕裂的现象日趋严重。由于缺乏统一的外交、安全和防御政策，它的国际影响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欧盟未来发展的有利条件也不应忽视。欧元区国家在应对债务危机方面取得了更多共识，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并未逆转，欧盟的组织职能有所增强，欧洲理事会成为正式机构并设立常任主席一职。高技术产业成为欧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提高能效、建设绿色经济方面，欧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三”指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在综合国力方面，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各有千秋。日本经济和技术力量远居俄罗斯、印度之上，人均收入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远高于中国。虽然由于经济停滞不前、人口萎缩和老龄化，以及中国的崛起，日本不如以往那么自信了，但很多日本人渴望国家走向“正常化”，走出二战阴影，成为美国的“平等”战略伙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俄罗斯资源丰富，国土广大，国民文化教育水平高，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天然气、石油、矿产品的出口，俄罗斯受到国际市场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需求波动的巨大影响。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负担，

生育率低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国内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等，也都是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长远制约因素。俄罗斯军事力量强大，在国际上敢说敢做。吞并克里米亚，对抗西方制裁，打击国内外亲西方势力，使普京在俄罗斯享有毋庸置疑的威望。但是，俄罗斯近来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外交也屡遭挫折，实力的恢复尚待时日。

印度在南亚的地位无可匹敌。印度人口比日本和俄罗斯年轻而有活力，经济发展深具潜力。在莫迪总理的有力领导下，印度人力资源优势得到释放，在国际事务中更加自信。但是，莫迪从上届政府手中接下的是经济发展失衡、人口负担沉重、贫富差距悬殊、基础设施薄弱、能源电力短缺、工业配套落后、外贸逆差巨大、外商投资手续繁琐、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体系。此外，印度党派和宗教冲突频繁，政权更迭导致决策力差，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因此，印度经济改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国际格局中的“多”，指巴西、墨西哥、印尼、越南、土耳其、伊朗、南非、尼日利亚等诸多新兴地区大国，以及韩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强国。同这些国家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资源保有和发展潜力方面可以类比的，还有阿根廷、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乌克兰等国家。

除中国的实力地位可望保持上升势头以外，未来几年内的世界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对比不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各大国的注意力在未来几年中将继续集中于内部问题。美国同欧盟的经济规模相当，但美国的发展后劲、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大于欧盟；日本经济落后于美欧，但其高新技术水平仍属上乘，军事力量亦将有所加强。俄罗斯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很难缩小。“金砖五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竞争力上升。

除中国的实力地位可望保持上升势头以外，未来几年内的世界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对比不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大国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大于变化。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政治、军事、经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依然巩固，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明显。中俄两国则在政治上日益接近。尽管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地区强国极力维护自身权益，对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传统主导地位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但没有也不会提出同西方完全对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不至形成两次世界大战前或冷战时期那种敌对的大国营垒。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大体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并且这种和平的变迁还将继续。

在国际力量格局趋于扁平化的同时，指导国家间关系的规则稳中有变。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和遵守。这些原则包括：互不干涉内政和主权原则；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反对种族歧视；市场开放、保护知识产权、产品安全、金融稳定；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核安全、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太空安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走私贩毒；促进公共卫生、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等。上述原则通过一系列国际组织、机制、条约、协定、会议体现出来。即使是那些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的朝鲜、津巴布韦等国家，也宣称赞成上述原则。

国际秩序的稳定或者说可持续性并不意味着国际规则的一成不变。事实上，在全球治理中有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领域，如网络、太空、极地等“高边疆”公域，以及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食品安全、全球卫生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的国际规则都尚待建立或完善。随着技术的进步，贸易、金融、投资等传统领域的国际规则也亟需调整。美国目前极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就包含着国际贸易的若干新规则。在中国倡导下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很可能带来一些国际投资规则的改变。中美两国间双边投资条约（BIT）的艰苦谈判，即围绕着负面清单等规则问题而展开。

三、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和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邓小平多次提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¹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分别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则号召“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中国官方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首次正式提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³ 此后，中国官方正式文件不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⁴ 可以理解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非完全不公正、不合理，但是需要改革。这份系统阐述中国对世界看法的白皮书还指

1 参见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283页。

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发布。全文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5/Document/307900/307900.htm>，2015年7月24日登录。

4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发布。全文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1000032/1000032.htm>，2015年7月24日登录。

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为更多国家提供了通过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实现振兴的历史条件,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在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进行改革创新,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

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对国际秩序的积极态度。例如,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5月指出:“在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特征。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愿同印度等广大国家共同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¹ 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又在会见英国《金融时报》总编时指出,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不是要另起炉灶,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中国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建设。……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互利才能共赢,才能符合多方利益,也符合中国根本利益,所以不存在打破现有秩序的问题”。²

2015年3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评论道:“国际秩序自然也需要与时俱进。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总的方向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尤其是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从而使这个世界更平等,更和谐,更安全。”³ 2015年6月王毅又说:“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是国际秩序的贡献者而非所谓‘搭便车者’。”⁴ 具体就亚投行而言,时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2015年7月表态说,“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⁵

从王毅等人的讲话和中国一贯的官方态度来看,中国虽然自我定位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但对其改革和发展方向有独特的看法和期待。对于国际秩序中力量

中国虽然自我定位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但对其改革和发展方向有独特的看法和期待。

1 《李克强在印度发表署名文章: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3年5月20日, http://www.gov.cn/ldhd/2013-05/20/content_2406788.htm, 2015年7月25日登录。

2 《李克强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伯专访实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5年4月16日,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4/16/content_2847342.htm, 2015年7月25日登录。

3 《王毅: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力量》,中国网,2015年3月8日, http://news.china.com.cn/2015lianghui/2015-03/08/content_34988939.htm, 2015年7月25日登录。

4 《王毅: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5年6月29日,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6/29/content_2886246.htm, 2015年7月25日登录。

5 《金立群亚投行演讲(全文)》,中国人才网,2015年7月7日, <http://www.cnrencai.com/yanjiang/201962.html>, 2015年7月25日登录。

结构这一部分，即主要力量的分布格局（实力对比）及其亲疏远近，中国没有明确的官方立场阐述。但是从一贯的官方表态和主流媒体的报道评论来看，除了自身力量的壮大以外，中国显然还希望其他金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的实力上升并且相互关系更为密切，希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团结自强。中国一直主张世界多极化。不言而喻的是，多极化状态只有在美国力量相对衰落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出现。

如果国际规则可以大致分解为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安全秩序、国际政治秩序，那么中国对经济秩序的认可度相对较高。20世纪70—9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一个传统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处理南北矛盾、缩小南北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要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使上述观点不攻自破。

中国认可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等原则，但是在诸如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汇率制度、金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中国的看法和实践与现行规则存在一定冲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金融组织中的投票权、话语权不足。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是导致这种不公平的“罪魁祸首”，现存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实力地位的反映，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2015年6—7月中国A股市值暴跌，官员、企业界、学术界以及普通公众中，许多人都相信是美国（未必需要指明是哪些美国部门或个人）在幕后操纵、“恶意做空”造成的，甚至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凸显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所起作用的深度不信任。

在传统国际安全领域，中国对现存力量分布和运行规则持复杂态度。中国认同并遵守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原则，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同其他大国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诸多非传统安全和“高边疆”公域，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全球卫生、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海上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海盗、走私贩毒、非法移民等问题上，中国也是“按规则办事”，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协调机制，同时也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修订”某些规则。

在安全秩序方面，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对美国在亚洲主导的军事同盟和相关安排表示不满，特别是强烈反感美日军事同盟及其强化。多数中国论者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联盟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是为了抵消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防力量。美国对台（湾地区）军售被视为支持“台独”倾向，代表了分裂中国领土的图谋。对于美国在中东、南亚、非洲、拉美的军事安排和活动，中国不轻易表态，只希望美国尊重相关国家主权。但是对于北约的继续存在及其作用，中国同俄罗斯的立场接近，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在政治领域，中国最为认同的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非洲、中东、前苏联国家等发生“颜色革

命”、“阿拉伯之春”或类似的政治变革之后，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更为警惕和抵制，对于西方支持和资助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也加强了管理。中国官方认为，西方国家利用国际秩序中的某些制度和规则（如人权原则、民族自决、人道主义干预）干涉他国内政，推翻他国政府，开创了恶劣的国际先例，是许多国家发生内乱的始作俑者。

归纳起来，中国对当今国际秩序有四个方面的变革期待：第一，提升中国、其他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第二，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第三，消解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安全同盟和军事安排的影响；第四，抵制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和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在上述四个方面，中国都在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推进国际秩序的改革。例如，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并逐步加以落实；倡导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绸之路基金；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合作并邀请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新成员；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主办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在20国集团和APEC等国际机构和机制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通过举办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和许多相关安全论坛，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加大对外文化传播力度，以经济合作和对外援助为手段，扩大海外政治影响，等等。

中国就推动国际秩序改革而所做努力的效果，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不顾美国的阻挠，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被称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和对现存国际金融秩序的冲击。有些努力的成效是潜移默化的，如加强了某些非西方国家的政府权威，抵制了西方“民主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研究了中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认为“中国没有显示在推动威权主义方面的传教士式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政策对民主的命运所起的作用无关紧要”。¹ 黎安友观察到，中国通过显示自身发展经验、援助某些威权国家等多种方式，阻挡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趋势。中国的另外一些努力，例如建立亚洲安全新秩序，则任重而道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判断其效果。

四、以加强秩序应对“失序”

当前国际秩序处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相对稳定的一个历史阶段，其中的大国力量平衡、规则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然而无法否认的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际体系中最大最强的主权国家，围

1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No.1, January 2015.

绕着力量对比和“游戏规则”正在产生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换言之，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核心是中美之争。中美关系的焦点，是中国力图维护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秩序和美国力图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¹意味深长的是，中美两国都感到自己是防御的一方，而对方是进攻的一方。中国人普遍感到，美国通过种种手段，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阻挠中国的国家统一；美国人则感到中国的国际行为愈来愈咄咄逼人，军事实力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经济上试图挤压美国的国际空间，损害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

在清楚易见的中美实力较量背后，是不甚分明的价值观较量，体现在如何界定国际规则的合法性。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评论基辛格所著《世界秩序》时说：“基辛格指出，要使一种世界秩序扎下根并持久维持，它必须使‘权力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为达此目的，这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听起来却惊人地理想主义。他提醒我们说，即使我们的价值观同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美国也是依靠坚定维护而非逃避我们的价值观而取得成功的，并且通过同其他民族和社会的互动获得合法性的来源，而不是通过仅仅同政府打交道，来实行领导。”²也就是说，无论是美国的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都认为美国对外行为的合法性必须通过介入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来获得，而不是只同主权国家的政府交往来获得。对比之下，中国人的国际秩序观念，包括“国际关系民主化”，都是以国家及其政府为核心的，其合法性的主要标准是主权和不干涉内政。

尽管对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观念差异很大，又不可避免地进行着实力地位的较量和竞争，中美两国依然同为现存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两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并非完全相反，而是可以做到并行不悖，即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所谈到的中美两国“共同进化”（co-evolution），“这意味着两国都注

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³

对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威胁，不是大国实力较量和价值观差异，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无序”或“失序”（disorder）现象。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人们可能过多关注了中美等大国之间在国际秩序中的竞争，以及乌克兰冲突、南海对峙、中日领土争端等所谓“地缘政治回归”的趋势。对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威胁，不是大国实力较量和价值观差异，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无序”或“失序”（disorder）现象。由于当前全

1 参见王缉思编著：《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265页；王缉思：《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5年7月10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937>，2015年7月25日登录。

2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illary Clinton Reviews Henry Kissinger’s ‘World Order,’”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4,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illary-clinton-reviews-henry-kissingers-world-order/2014/09/04/b280c654-31ea-11e4-8f02-03c644b2d7d0_story.html, 2015-07-25.

3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526.

球经济发展迟缓，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贫富悬殊加大，生态环境恶化，各大国内部和各地区普遍存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的压力，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宗教认同和族群认同所引发的社会躁动和政治动荡。煽动民族主义甚至仇外情绪，诱过于外，成为一些国家中某些利益集团的国内政治工具。所谓“地缘政治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些国家内部矛盾的向外转移和向外投射。中东一些地区持续的动荡冲突，“伊斯兰国”崛起之血腥和暴力，乌克兰走向分裂和混乱，某些非洲国家继续深陷于贫穷困顿的泥潭，种种乱象和惨剧的消除，都需要大国的协调与合作。

如此看来，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公正，需要的是更多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大国间的相互牵制、相互削弱。一个强盛的中国、强盛的俄罗斯、强盛的美国、强盛的欧盟、强盛的印度、强盛的日本，还包括强盛的乌克兰、强盛的伊朗，等等，比任何国家的衰落对国际秩序的贡献都要大得多。

同“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相比，“世界秩序”(world order)或许是一个更加面向未来、更具理想色彩的概念。目前的国际秩序能否不断地调整、变革，和平地演进为一个世界秩序或者全球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在现行秩序中兴起的大国，同时又是一个拥有“天下大同”观念的数千年文明的继承者，理应在世界秩序的构筑中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许倬云在《说中国·自序》中说：“中国固然在变，我们也必须认知：世界也在变。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时，世界可能重组，成为人类共同归属的庞大复杂体系，不能永远停留于列国体制的不绝斗争之中。如果大家要建构一个‘天下模式’的世界秩序，中国曾经尝试数千年的经验，无论成败、得失，应当都有值得参考之处。”¹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语，奥运会的组织者将这个主题语解释为“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有美好家园，共享文明成果，携手共创未来的崇高理想”。²虽然今日世界仍然充满动荡和纷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无疑是一个值得期盼的理想，尽管它还十分遥远。

1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2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人民网，2005年6月2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498568.html>，2015年7月25日登录。